

南唐烈祖的個性與文藝活動

陳葆真

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

一、南唐簡史——由盛而衰的國勢

南唐自烈祖李昇於後晉天福二年（937）代吳（902～937）自立，到宋太祖開寶八年（975）十二月亡國，期間共經三主：烈祖（937～943），中主（943～961），和後主（961～975），享國三十九年。相較於兵火連年的北方中原，南唐偏安江左，得天獨厚。烈祖建國之初，以金陵為國都，廣陵為東都，領土包括了江北十四州和江南十九州。所轄領域主要為今日的江蘇、湖北、安徽、和江西等富庶之區。江北十四州，主要是以廣陵（今揚州）為中心的蘇淮地區。廣陵自隋煬帝開鑿運河，聯絡南北交通後，歷經唐代的經營，已經發展成為長江以北最重要的商業及軍事重鎮，控扼運河糧運及南北交通的樞紐；而沿海地區又富有漁、鹽之利，尤其是鹽產，更為當時主要的民生必需品。至於江南十九州，主要是以都城金陵（今南京）為中心的江蘇、安徽、和江西地區。這些地區位居長江下游，土壤肥沃，為漁米之鄉，因此，民生富裕，文風鼎盛。金陵為六朝故都，天然形勢壯麗雄奇，人文薈萃，史蹟更是豐富。烈祖在此建都，金陵便成為南唐的政治、經濟、和文化中心。烈祖年號昇元，在位七年（937～943）。當他壯年（56歲）而薨之時，南唐可稱是當時全中國最安定而富庶的地方。它的國力充沛，府庫充實。烈祖臨終時，勸誡中主：「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，汝守成業，宜善交鄰國，以保社稷……。」^①當時他心中所唯一掛慮的是來自北方的威脅，因此又警告中主說：「北方有事，不可忽也。」^②

①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四部叢刊本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），卷1，烈祖本傳，頁8；又同樣資料見於龍峯，《江南野史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（臺北：商務印書館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，1983），冊464，頁73。

②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，冊464，頁124。類似用語又見於無名氏，《釣磯立談》，四庫全書，冊464，頁53。

中主(李璟)年號有保大、中興、交泰,後奉周、宋正朔,在位共十九年(943~961)。^③他曾經野心勃勃,一度向南北伸張勢力,有一統中國之志。在南進方面,他曾於即位後第三年(保大三年,945)派馮延魯和陳覺率軍攻下閩國所屬的福建建州,迫降汀州和泉州,在那兒設置永安軍。^④二年後(947)由於吳越派軍助閩,唐兵大潰,不得已才撤軍,但烈祖遺留下來的財富也因此而消耗殆盡^⑤。但中主仍野心不減,再西向滅楚,得到勝利。^⑥在面對中原方面,中主曾一度想結盟契丹,入主中原,但因契丹不肯而作罷。^⑦然而,他在北進的工作上,卻遭遇到很大的挫折。從保大十二年(後周顯德元年,954)到交泰元年(後周顯德五年,958)的四年之間,他幾度與後周交兵,結果慘敗。為此,他付出了極大的代價:不僅割讓所有江北十四州的領土給後周,入貢稱臣,並且去國號,改稱國主,奉周正朔。^⑧北宋建國後第二年(961),中主更害怕北兵渡江來犯,於是遷都到洪州(南昌),但不久便悒鬱而卒。

後主(李煜)即位金陵,奉宋正朔,沒有年號,在位共十五年(961~975)。這時的南唐,已失去了原有國土的一半,經濟實力大受打擊,連民生必須品的鹽,也因失去江北諸州,而得依靠北方的後周和宋朝,年年限制性的供給三十萬噸,以維持生活所需。又由於長年對後周和宋朝納貢,致使國庫匱乏。^⑨原來使用的銅錢大量流失,無力再鑄,只好兩度改鑄鐵錢,

幣值因而大貶。^⑩經濟凋敝的結果,朝廷只好加重稅捐,所謂「民間鵝生雙子,柳條結絮皆稅之。」此時江南的重稅,比起它的前身吳國統治時,加重了好幾倍。^⑪於是,原本富庶的漁米之鄉,在偶而欠收的年歲中,竟然也會因積糧不足而導致大飢荒,甚至要靠北方敵對的宋朝來救濟。^⑫更可悲的是,連戰鬥用的馬匹,也得靠敵對的宋朝賜予。^⑬南唐的國防戰備,除了水軍之外,根本無法與宋人對抗。從烈祖建國到後主在位,短短的三十多年之間,南唐國勢的由盛而衰,變化之大,實在令人惋歎!

後主在位的十五年中,完全採取忍辱求生的態度來侍候北方的宋朝,比如去國號,向宋稱臣,奉宋年號,降官爵、制度,以地方政權自居,經常派諸王重臣入貢、朝賀、請安等等。他對於宋朝的反應更是戰戰兢兢,惟恐得罪。最明顯的是,每逢宋使要到金陵前,後主便下令取下宮殿屋頂上的鴟吻,不敢顯示廟堂的尊嚴,而他自己也換下帝服,改穿紫袍迎接,宋使離去後,才敢復原。^⑭但這些謹言慎行都不足以息事寧人,更不足以按捺宋太祖統一中國的雄心。宋開寶七年(974),太祖命後主到汴京參與祭天的柴燎之禮。後主知道如果前去便會被扣押,因此,稱病不奉詔。^⑮這給了宋朝出兵懲罰的藉口。同年九月,太祖派大將曹彬和潘美率水軍下長江直逼金陵,同時又邀位於江浙的吳越出兵夾擊南唐。後主二度派徐鉉入汴求太祖緩兵。^⑯徐鉉力辯南唐事宋殷勤,毫無過失。但宋太祖乾脆回答:「不須多言,江南亦有何罪?但天下一家,卧榻之側,豈容他人鼾睡?」^⑰表示無理可喻,志在必得的決心。開寶八年(975)十一月,金陵終被攻陷,後主自殺未遂,出城降宋,南唐亡。開寶九年(976)正月,後主與后妃、宗室及降臣共四十五人抵汴京,太祖封為違命侯,授左千牛衛上將軍。^⑱同年

③ 保大共十五年:943~957;中興和交泰元年為958;奉周年號:顯德五年~六年,958~959;奉宋年號:建隆元年~二年,960~961。

④ 見司馬光,《資治通鑑》(臺北:世界書局校印本,1969),冊15,卷285,後晉齊王開運二年(945)事,頁9296~9297。

⑤ 見司馬光,《資治通鑑》,冊15,卷286,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(947)事,頁9349~50。

⑥ 見司馬光,《資治通鑑》,冊16,卷290,後周太祖廣順元年(951)事,頁9467~9472。

⑦ 見司馬光,《資治通鑑》,冊15,卷286,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(947)事,頁9338;又見同書,冊16,卷292,後周世宗顯德元年(954)事,頁9532;卷293,後周世宗顯德三年(956)事,頁9541,9562。

⑧ 見司馬光,《資治通鑑》,冊16,卷292,後周世宗顯德元年(954)~卷294,顯德五年(958)事,頁9534~9583。

⑨ 南唐缺鹽事,參見馬令《南唐書》,四部叢刊本,卷4,〈嗣主書〉,頁20;陸游,《南唐書》,卷2,頁13~14。又,參見竺沙雅章,《獨裁君主の登場—宋の太祖と太宗》(東京:清水書院,1984),頁121。南唐入貢後周及北宋事例,見無名氏,《南唐史》,收入清代稿本百種彙刊(臺北:文海書局,無出版年月),〈兩朝事大〉條,頁111~135。

⑩ 陸游,《南唐書》,卷3,〈後主本紀〉,頁16;又參見畢沅,《續資治通鑑》(臺北:世界書局重印,1962),卷3,宋乾德元年(963),頁76。

⑪ 見曾敏行,《獨醒雜志》,(楊萬里淳熙乙巳1185年序),四庫全書,冊1039,卷1,頁527。

⑫ 見畢沅,《續資治通鑑》,卷5,乾德五年(967)事,頁112。

⑬ 見曾敏行,《獨醒雜志》,頁529~530。

⑭ 參見陳彭年,《江南別錄》,頁127;馬令,《南唐書》,卷5,頁22;陸游,《南唐書》,卷3,頁16~17。

⑮ 同上註。

⑯ 見馬令,《南唐書》,卷23,頁95。

⑰ 太祖回徐鉉的這段話,不見於馬令,《南唐書》,而見於王稱,《東都事略》(臺北:中央圖書館重印,1990),冊1,卷23,李煜傳,頁402。

⑱ 陳彭年,《江南別錄》,頁128,龍衮,《江南野史》,卷3,頁84;馬令,《南唐書》,卷3,頁26;陸游,《南唐書》,卷3,頁18;王稱,《東都事略》,冊1,卷23,頁403。

十月，太祖駕崩，太宗即位，十二月即改年號為太平興國元年，改封後主為隴西公。太平興國三年(978)七月七日，太宗遣人祝賀後主四十二歲生日，賜酒，以牽機藥毆殺後主，葬之於洛陽北邙山，並追封為吳王。南唐舊臣徐鉉奉太宗之命為後主寫了墓誌銘。¹⁹

南唐雖因武力不敵而亡於宋兵之手，南唐舊臣也隨之仕宋；但是他們對於故國之亡，只是歸於天命氣數，對於後主之失國，毫無怨懟之詞。當後主死訊傳到金陵之時，百姓痛哭，並為他設奠遙祭，尊為仁主。這可見民心之所向，更可看出南唐三主勤政愛民的治績。²⁰

南唐享國只有三十九年，然而文化建設之盛凌駕於各國之上，其中包括：貢舉、書院、和人才的延攬，這是史家一致公認的。先以貢舉為例：當代史家陳彭年明白指出：

烈祖初立，庶事草創，未有貢舉。至元宗始議興置。時韓熙載、徐鉉兄弟為當代文宗，繼以潘佑、張洎以才名顯。後主尤好儒學，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元、元和之風。²¹

其次再看書院的設立，以廬山的白麓洞書院為代表，根據畢沅的記載：

白鹿洞在廬山之陽，常聚生徒數百人，江南李後主時，割善田數十，歲取其租廩給之。選太學通經者，授以他官，俾領洞事，日與諸生講誦。……²²

根據文獻記載，當時隱居在廬山一帶的儒者很多，包括劉洞、江為、陳貺、史虛白、伍喬、許堅、毛炳、和鄭元素等人，而白麓洞便成為學者活動的中心。²³ 因此，後主更特別撥調官田租稅以充當書院的經費。²⁴

當時南唐朝中，不但包括江南本地的文臣，而且也有中原來奔的儒臣，

其中最有名的是韓熙載。²⁵ 這些文人的南奔，主要是要逃避北方連年的戰亂，到富庶安定的南方，尋求一展長才的機會。南北人才的薈萃，更推動了南唐文化活動，致使南唐文風鼎盛一時，連契丹和高麗等外族都慕名來貢，把它當作是大唐帝國文化的沿續。這種情形馬令在他的《南唐書》，〈儒者傳〉序言中說得很清楚：

……五代之亂也，禮樂崩壞，文獻俱亡，而儒衣書服，盛於南唐，豈斯文之未喪，而天將有所寓歟？！不然則聖王之大典掃地盡矣。南唐累世好儒，而儒者之盛，見於載籍，燦然可觀。如韓熙載之不羈，江文蔚之高才，徐鉉之典瞻，高越之華藻，潘佑之清逸，皆能擅價於一時，而徐鉉、湯悅、張洎之徒，又足以爭名於天下。其餘落落不可勝數。故曰：江左三十年間文物，有元和之風，豈虛言乎？！²⁶

而元代學者趙世延在為陸游的《南唐書》刊行序言中也明白指出：

……(南唐)雖為國偏小，觀其文物，當時諸國莫與之並。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，而張延翰、劉仁贍、潘佑、韓熙載、孫忌、徐鉉之徒，文武才業，忠節聲華，炳耀一時，有不可揜矧。其間政化得失，興衰治亂之蹟，有可為世鑒戒者，尤不可泯也。竊謂唐末契丹雄盛，虎視中原，晉漢之君，以臣子事之惟謹，顧乃獨拳拳於江淮小國，聘使不絕，當獻橐駝，拜羊馬千計。高麗亦歲貢方物，意者久服唐之恩信，尊唐餘風，以唐為猶未亡也邪？！²⁷

這些文化上的成就，實應歸功於南唐三主本身的文藝修養，以及他們對文化建設的重視。以下，我將從當時的時代背景中，分別探討烈祖、中主、和後主三人的個性，文藝修養，和在他們的領導下，南唐文藝發展的情形。由於篇幅所限，本篇先論烈祖，至於中主和後主的部份，則將在他篇中討論。

¹⁹ 銘文見徐鉉，《時省集》，四庫全書，冊1085，卷29，〈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吳王隴西公墓志銘并序〉，頁221～223。

²⁰ 參見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8～129；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5，頁26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3，頁18。

²¹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7。

²² 畢沅，《續資治通鑑》，卷9，太平興國五年(980)事，頁250。

²³ 參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3～15，〈儒者傳〉及〈隱者傳〉，頁56～66。

²⁴ 關於南唐的學校和貢舉，參見無名氏，《南唐史》中的專論，頁181～196。

²⁵ 韓熙載傳記資料，參見徐鉉，〈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韓公墓誌銘〉，收於《時省集》，卷16，頁122～124；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3，頁56～57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9，頁55～57。

²⁶ 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3，〈儒者傳〉序言，頁56。又，《釣磯立談》頁57中也有類似記載：「當是時，天下瓜裂，中國衣冠多依齊台，以故江南稱為文物最盛處……」。

²⁷ 趙世延，〈南唐書序〉，見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頁1。

二、烈祖的個性特色

烈祖本名李昇，原為徐州李榮之孫，父李志早卒。^{②⑧} 唐昭宗乾寧二年（895），李昇八歲，當時以揚州為據點的楊行密攻下濠州，見烈祖相貌不凡，取以為養子，但為行密長子楊渥所不容，因此，改由行密部將徐溫收養，改名為徐知誥。但又有一說以為：「（烈祖）孤，有姨出家為尼，出入徐溫宅，與溫妻李氏同姓，帝亦隨姨往來。溫妻以其同宗，憐其明慧，收為養子。」^{②⑨} 唐昭宗天復二年（902），楊行密自立為王（902～905），建都廣陵，國號吳，後來傳位給他的三個兒子：楊渥（905～908）、楊隆演（908～920）、及楊溥（920～937）。徐溫為重將，出鎮金陵。徐知誥長大後，「身長七尺，廣額隆準，精彩鑠人」，而且「姿貌瑰特，目瞬如電，語音厚重，望之懾人，與語可愛」，^{③①} 又才幹和謀略都超越徐溫諸子，而受重用：先受命守潤州（909年），後轉鎮廣陵（918年），楊隆演時拜左僕射（919年），楊溥時，又拜為侍中（926年）。而當徐溫過世（927年）後，他的地位更為重要，實掌吳國大權。又因為他的次子景遷為吳王女婿，而女兒則嫁給吳王之子楊璉為妻（937年），這樣與王室聯姻的結果，更鞏固了他的政治地位。後晉天福二年（937）他終於代吳自立，建都金陵，國號唐，尊養父徐溫為義祖，遷吳王楊溥為讓皇。兩年後（939），他恢復了本姓李名昇，並將他的譜系追溯到唐朝玄宗時信安王李祚的祖父吳王之後。^{③②} 這些措施，表明了他以承繼唐朝政權為職志的雄心。

一個人的成敗和命運，與他的個性息息相關。以我的觀察，烈祖個性的特色，可歸納為三點：長於謀略、節儉勤政、愛好文藝。因為這些特點，使

②⑧ 關於烈祖的出身，有兩種說法：一般都說他是江蘇徐州人，如鄭文寶，龍衮，馬令，陸游，司馬光等人，見前揭書，但另一說，以為他是湖州安吉人，本姓潘，見《吳越備史》；又有後人懷疑他本不姓李，是為冒唐朝王室之後才冒姓李等等，詳見夏承焘，《南唐二主年譜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4重印），頁1～2。此處延用鄭文寶，《江表志》，四庫全書，冊464，卷1，頁132所記。因鄭文寶為南唐舊臣，對於史實應較明瞭。

②⑨ 這兩種說法分別見於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4，卷260，頁8467；和鄭文寶，《江表志》，卷1，頁132。

③① 前者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，頁6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，頁4；後者見龍衮，《江南野史》，卷1，頁70及73。

③② 關於烈祖發展的這段歷史參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4，卷260，頁8467～冊15，卷282，頁9199。景遷為吳王婿，事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7，頁33，又見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頁74。

他崛起於亂世，代吳自立，建立南唐。而勤於治國和崇尚文儒的結果，吸引了大批文士群集，使南唐文藝發展為各國之冠。以下，我將舉相關史實來說明我的論點。

1. 烈祖的長於謀略

由於烈祖的長於謀略，才能在亂離之際遇中，脫穎而出，成就大業。他本是個八歲失怙的棄兒，在兵馬倥傯之中，輾轉被人收養。在養家兄弟的嫉妒裡，任勞任怨，力爭上游，發展才幹，獲得重用，終而代吳自立。他的個性具有多面性，既富於情感，同時又重於理智。首先我們可以從他對養父徐溫的孝行裡，看到他個性中溫婉淳厚的一面。根據陳彭年的《江南別錄》：

烈祖奉義祖以孝聞。嘗從義祖征伐，有不如意，杖而逐之。及歸，拜迎門外。義祖驚曰：『爾在此邪？』烈祖泣曰：『為人子者，舍父母何適？父怒而歸，母子之常也。』義祖由是益憐惜。^{③③}

而龍衮的《江南野史》，對於烈祖對義祖的孝行，更有歷歷如繪的描述：

先主雖少，而天性穎悟，夙敦子道。朝夕起居，溫清左右，承顏侍膳。……及遇溫戚屬，皆能俯躬迎奉。溫婦見之而頗鍾愛，撫養無異……知誥既長，溫為娶，其婦亦能奉蘋藻，致柔順之美。溫嘗卧疾，唯先主躬侍左右。至於羹溺皆親執器，動至連月。踰時扶掖出入，或通宵達曙，曾不解帶。或夜聞謦欬聲，乃率婦同往者數四。……溫見其篤於孝養，而復能幹家，知非常品，而諸子難及……溫凡出征討，而疑其帳下，故先主常得奉侍，遂習熟武事，因能騎射，起家為偏將……^{③④}

由以上諸例，可以得知烈祖在徐家成長的過程，以及由於他的孝行，而得到徐溫全力的培植和信賴。

另外，則是他剛烈的一面。鄭文寶在《江表志》中，一再提到「烈祖性多嚴忌」。當他對下屬不信任時，也會用嚴刑：「以竹籠乘之，沈於江

③③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3。

③④ 龍衮，《江南野史》，卷1，頁70～71。

口。」而當他震怒時，更是雷霆萬鈞，無人敢犯：「烈祖矜嚴峻整，有難犯之色。常怒作數聲，金鋪振動……」。^{③④}晚年他又因服食金石丹藥，而助長這種急躁剛烈的脾氣，最後終於因此而暴斃。^{③⑤}烈祖雖因長期歷經艱困環境的磨鍊，而形成暴躁的個性，但是，他總是極力以理性予以克制，因此，仍是一個個性剛烈的明君。司馬光對於他的一些善政仍是相當肯定的：

自烈祖相吳，禁壓良為賤，令買奴婢者，通官作券。^{③⑥}

唐主自為吳相，興利除害，變更舊法甚多。及即位，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為《昇元條》三十卷。^{③⑦}

唐主當夢吞靈丹，旦而方士史守沖獻丹方，以為神而餌之，浸成躁急，左右諫，不聽……群臣奏事，往往暴怒，然或有正色論辯中理者，亦歛容慰謝而從之。^{③⑧}

烈祖的長於謀略也是史書明言的事實。鄭文寶的《江表志》說：「帝沈幾遠略，莫知其際。」^{③⑨}這種個性原是他從小為了應付徐家諸子對他的欺凌，而漸漸發展出來的本事。徐家諸子中以三郎徐知訓對他最為惡劣。據陳彭年的《江南別錄》：

義祖以己子既弗克負荷，用烈祖猶愈於他人。因留輔政。先是，知訓待烈祖甚悖，每呼為乞子。與諸弟夜飲，遣召烈祖。烈祖不至，知訓怒曰：『不喫酒，喫劍乎？』餘皆類此……^{④⑩}

對於知訓的欺侮，烈祖始終忍耐，不與他正面衝突，但求伺機報復。只可惜知訓先他而死。^{④⑪}後來當徐溫過世，他武功日盛，執吳國大權時，便

③④ 見鄭文寶，《江表志》，卷1，頁134。

③⑤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4；鄭文寶，《江表志》，卷2，頁134；又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5，卷283，頁9245。

③⑥ 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5，卷283，頁9246。

③⑦ 同上註，頁9240。

③⑧ 同上註，頁9244。關於史守沖傳，見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14，頁80。

③⑨ 鄭文寶，《江表志》，卷1，頁132。

④⑩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3。

④⑪ 同上註。

回過頭來，想法斃殺徐家另一個兄弟徐知詢，手法相當狠毒。^{④⑫}

烈祖的長於謀略，使他從一個失怙的孤兒，崛起於兵火之間，成為南唐的開國君主，可算是亂世英雄。以下，我據《資治通鑑》所載，集成他的生平大事記，以見他的創業經過：

南唐烈祖大事年表

(據《資治通鑑》冊14，15，卷260～283，頁8467～9256)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|
| 895 唐昭宗乾寧二年 | 李昇八歲。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攻濠州，得之為養子。後轉由徐溫收養，改名為徐知誥。(冊14，卷260，頁8467。)有關知誥八歲至二十二歲(895～909)之間，隨徐溫轉戰征伐事，見卷260～267，頁8476～7；8484；8485～6；8492；8502；8509～11；8520～22；8543；8557；8573。 |
| 902 唐昭宗天復二年 | 唐封楊行密為吳王(902～905)，都廣陵。(卷265，頁8573。) |
| 905 唐哀帝天祐二年 | 楊行密薨，子楊渥繼位。(卷265，頁8652。) |
| 908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 | 楊渥卒，弟隆演繼位。(卷266，頁8698。) |
| 909 後梁太祖開平三年 | 徐溫治金陵，徐知誥治潤州。(卷267，頁8708。) |
| 918 後梁末帝貞明四年 | 知誥至廣陵，平朱瑾之亂，代知訓執吳大政，士民歸心。(卷270，頁8831。) |
| 919 後梁末帝貞明五年 | 楊隆演卒，行密幼子溥即吳國王位。知誥為左僕射。徐溫為大丞相。(卷270，頁8843～44。) |
| 920 後梁末帝貞明六年 | ①徐溫父子專政。
(冊15，卷271，頁8855。) |
| | ②吳修金陵城。
(卷271，頁8860。) |

④⑫ 參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4，卷276，頁9036。

- 926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 ①徐知誥為侍中。
(卷274, 頁8971。)
- ②後唐青州專使北海韓叔嗣之子韓熙載奔吳。
(卷274, 頁8992。)
- 927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 ①吳大丞相徐溫卒, 贈齊王。
(卷276, 頁9010。)
- ②徐知誥為都督中外諸軍, 實掌吳國大權。
(卷276, 頁9011。)
- 929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 徐知誥專權, 欲耽知詢, 未果。
(卷276, 頁9036。)
- 931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 徐知誥治金陵。
(卷277, 頁9062~63。)
- 932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 徐知誥擴建金陵城周圍二十里, 將以貽子孫。
(卷278, 頁9076。)
- 933 後唐明宗長興四年 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王都金陵。知誥乃營造金陵。
(卷278, 頁9082。)
- 934 後唐漢王清泰元年 ①正月, 徐知誥治私第於金陵。
(卷278, 頁9100。)
- ②知誥思自立為王。(頁9103。)
- ③二月, 吳王詔知誥還府舍。
- ④甲申, 乙酉, 金陵二度大火, 知誥疑有變, 勒兵自衛。(頁9104。)
- ⑤徐知詢卒。徐知誥將受禪。(頁9121。)
- 936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 ①正月, 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, 以幕職分判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及鹽鐵司。
(卷280, 頁9138。)
- ②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, 勸即帝位。
(卷280, 頁9141。)
- ③十一月, 吳王詔齊王徐知誥置百官, 以金陵府為西都。
(卷280, 頁9153。)

- 937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 ①吳太子楊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。
②徐知誥始建太廟社稷, 改金陵為江寧府。
(卷281, 頁9169。)
- ③徐知誥更名誥, 示不與徐氏兄弟同
(卷281, 頁9172。)
- ④五月, 徐誥用宋齊丘策, 欲結契丹以取中國。契丹亦遣使報之。
(卷281, 頁9173。)
- ⑤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到金陵, 勸徐誥受禪, 誥讓不受。
(卷281, 頁9180。)
- ⑥七月, 吳王楊溥命江夏王楊璘奉璽綬、禪位于齊王徐誥。
(卷281, 頁9181。)
- ⑦十月, 齊王徐誥即皇帝位于金陵, 改元昇元, 國號唐。宮室、乘輿、服御皆如故。宗廟、正朔、徽章、服色悉從吳制。以金陵為國都, 廣陵為東都。
(卷281, 頁9182。)
- 938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 ①七月, 唐太府卿趙可封請唐主復姓李, 立唐宗廟。
(卷281, 頁9190。)
- ②十月, 吳讓皇楊溥薨。
(卷281, 頁9195。)
- 939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 ①正月, 唐主復姓李, 立唐宗廟, 不上尊號, 又不以外戚輔政, 宦者不得預事。此皆他國不及之策。
(卷282, 頁9197~98。)
- ②二月, 唐主更名昇。附系譜於唐玄宗朝信安王李禕之祖吳王之後。
(卷282, 頁9199。)
- ③四月, 唐人遣讓皇楊溥之族人於泰州, 賜讓皇子朝服, 即日卒。
(卷282, 頁9202。)

940 後晉高祖天福五年 二月，唐主婿楊建謁讓皇楊溥陵，還後大醉，卒於舟中。

(卷282，頁9210。)

941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 ①唐主拒漢主之議共謀取楚以分其地，又拒出兵復唐朝舊疆。

(卷282，頁9221~22。)

②唐主自以專權取吳，尤忌宰相權重。

(卷282，頁9225。)

③唐主勤儉諸例。

(卷282，頁9230。)

942 後晉高祖天福七年 ①唐主服金石，性暴烈易怒。

(卷283，頁9244。)

②唐主崩。太子景通即位為元宗，名璟，後改為景。改元保大。

(卷283，頁9245。)

943 後晉高祖天福八年 十一月，唐葬光文肅武高皇帝(李昇)於永陵，廟號烈祖。

(卷283，頁9256。)

又、據陳彭年所記，烈祖在臨終時，「嚙元宗指，見血，曰：『北方有事，不可忽也！』」^⑬ 後來南唐果然先後被北方的後周和北宋侵凌，終至滅亡。從以上這些事實，更可看出烈祖的謀略之深及見識之透澈。

2. 烈祖的節儉勤政

烈祖的節儉勤政，在五代十國諸君中是相當特殊的。關於這點，陳彭年有一段記載：「烈祖日於勤政殿視政，有言事者，雖徒隸必引見。善揣物情，人不能隱，千里之外，如在目前。」^⑭ 而《釣磯立談》中也有如下的記錄：

烈祖初得政，盡反知訓之所為。接御士大夫，曲加禮敬。躬履樸素，屏去浮靡。而又寬刑勤理，孜孜不倦。是時方鎮窺伺，事資彈壓。烈

祖視聽不妄，指撝中節。平居自號曰『政事僕射』，高位重爵，推與宿舊。故得上下順從，人無異志。^⑮

類似的事，在《資治通鑑》和陸游的《南唐書》中也有記載：

唐主性節儉，常躡蒲屨，盥用鐵盥。暑則寢於青葛帷。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，服飾粗略。^⑯

陸游又說：

(烈祖)建國，始即金陵治所為宮，惟加鷗尾設闌檻而已，終不改作。元宗為太子，欲得杉木作板障。有司以聞。帝曰：『杉木固有之，但欲作戰艦，以竹作障可也。』^⑰

烈祖的樸實無華，清廉勤政，在五代十國諸君中，只有後周太祖(951~954)和北漢劉崇(在位951~954)兩人可以與他比美。^⑱ 至於他的英明則和五代其他君主、武將各種駭人聽聞、凶殘暴虐、荒淫無道的行為形成了強烈的對比。《資治通鑑》中不乏這類的例子，比如閻主的殘忍；楚王的豪奢荒淫；後漢陽帝的驕奢；後晉齊王的奢華淫亂；和南漢主的殘暴等等。^⑲ 兩相比較之下，更明白了南唐之所以能成為五代十國中的一塊樂土，實在不得不歸功於烈祖的英明和他實行仁政的結果。

至於烈祖的仁政，則根本奠基在他的個性和能力之上。除了以上所指他是個重感情又富理智，既長於謀略又具有遠見的武人之外，烈祖也是一個能詩能書的文士。他的文藝修養使他能够禮賢下士，招徠賢者，為南唐樹立重視文教的典範。以下我們來看烈祖的文藝活動。

^⑮ 無名氏，《釣磯立談》，頁47。

^⑯ 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5，卷282，頁9230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，頁8，所記與此大同小異。

^⑰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，頁8。

^⑱ 有關後周太祖事，參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5，卷290，頁9454~55；劉崇事，見同書，卷291，頁9500。

^⑲ 關於這些實例，參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卷282，頁9205~6，9211，9244~6；卷283，頁9240~2，9249，9251，9254~5，9267，9269；卷285，頁9295~6；卷287，頁9376；卷288，頁9409；卷289，頁9449；卷290，頁9458。

^⑬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4。又，烈祖永陵在1950年出土，參見曾昭燏等編，《南唐二陵發掘報告》(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57)。

^⑭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4。

3. 烈祖的文藝活動

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分為兩方面來看：一是烈祖本身的文藝修養，另一則是他對於文藝的贊助活動。首先我們來看他的文藝修養。根據文獻所載，烈祖本人喜好書法，能作詩，也有收藏。關於他的書法，陳彭年的《江南別錄》中只說他「長善書」；^{⑤⑩}而龍袞的《江南野史》中也簡略提到：「先祖唯習書，計暇則肆射，所志必精。」^{⑤⑪}至於他的書法是何種面目，則沒有明言。由於他的書蹟不存，因此無法進一步討論他的書風和藝術成就。但是，由於喜歡書法而收藏古代名作，則是一件自然的事。根據馬令和陸游，烈祖有相當數量的圖書收藏：

(烈祖)建書樓於別墅，以延四方之士。^{⑤②}

烈祖以東海王輔吳，作禮賢院，聚圖書萬卷及琴奕遊戲之具，以延四方賢士，政事之暇，多與之講評古今……^{⑤③}

很明顯的禮賢院是烈祖的圖書館，但它的收藏是否包括書法，不得而知。值得注意的是他另外的建業文房則是收藏書畫的地方。目前臺北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《唐懷素自敘帖》草書卷(777)，上面蓋有篆刻「建業文房之印」(圖1)，並有南唐兩位官吏的重裱題記：「昇元四年二月日，文房副使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臣邵周重裝」；和「崇英殿副使知崇英院事兼文房官檢校工部尚書臣王□□。」(圖2)^{⑤④}據卷末高士奇的推想，此處的王□□應為王紹顏。^{⑤⑤}又依我的看法，王紹顏的題識當在昇元四年

(940)十一月以前完成，因為崇英殿在西都(金陵)，昇元四年十一月庚辰之後便改為延英殿。^{⑤⑥}也就是說這卷作品曾於昇元四年(940)之前在崇英殿重裝後，移放到建業文房，加蓋印記，成為烈祖的珍藏，這是相當明確的史實。傳世的南唐收藏印記有：「內殿圖書」，「建業文房之寶」，「內司文印」，「集賢殿書印」，「集賢院御書印」等。^{⑤⑦}其中多半，甚或全部，可能都始用於烈祖之時，而就中「內殿圖書」的「內殿」很可能是指凝華內殿而言。^{⑤⑧}現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韓幹《照夜白》上所鈐的，很可能是這方收藏印(圖3)。像懷素《自敘帖》那樣的名作，日後在中主和後主持續的努力下，累積成數量相當可觀、而品質絕佳的收藏。^{⑤⑨}後主時曾選擇其中的精品，命徐鉉將它們摹搨上石，分別刻成了著名的南唐法帖：《昇元帖》、《保大帖》、和《澄清堂帖》。這三帖後來並成為宋太宗在淳化三年(992)敕命王著摹刻的《淳化閣帖》的祖本來源。^{⑥⑩}

烈祖也長於作詩。他傳世最早的作品是他作於九歲時的《詠燈》：「一點分明值千金，開時惟怕冷風侵；主人若也勤挑撥，敢向尊前不盡心。」^{⑥①}這首詩明顯地以燈自喻，期望照料，又明示忠心。據說他的養父徐溫見了讚賞不已。另一首傳說是他作於十歲的《詠竹詩》，其中二句：「栖鳳枝梢猶軟弱，化龍形狀已依稀」，顯示他年紀雖輕，而胸懷大志的氣象。^{⑥②}

烈祖在書法和文藝上的嗜好和修養，半因天性，半由他的精進自持所致。回顧他所生長的環境，是武人奪權專政、割地稱王的時代，毫無文藝氣

⑤⑩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3。

⑤⑪ 龍袞，《江南野史》，卷1，頁70。

⑤⑫ 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，頁9。

⑤⑬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6，陳覺傳，頁42。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21，頁82之陳覺傳中沒有這段記載。

⑤⑭ 見臺北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故宮書畫錄》(臺北：故宮博物院，1965)，冊1，卷1，頁29。又，關於懷素這卷《自敘帖》是否為真蹟的問題，參見啟功，〈論懷素《自敘帖》墨迹本〉，《文物》，1983年，12期，頁76~87；何傳馨，〈懷素《自敘帖》在明代之流傳及影響〉，收於《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》(臺北：故宮博物院，1992)，頁661~684。

⑤⑮ 見《故宮書畫錄》，頁34。

⑤⑯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，頁7，昇元四年事。關於王紹顏，參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5，卷282，頁9230，昇元五年事。

⑤⑰ 參見那波利貞，〈五代の文化と書〉，收於神田喜一郎等編，《中國書道全集》(東京：平凡社，1956)，卷10，頁32。又，劉道醇，《五代名畫補遺》(臺北：中央圖書館重印，1974)，頁5a~5b中列出竹夢松畫上有李璟「合同印」及「集賢院印記」，由此可知烈祖這些收藏印，中主以後仍續用。

⑤⑱ 昇元四年凝華內殿前部改為昇元殿，後部改名雍和殿。見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1，頁70。

⑤⑲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8：「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，好求古跡，官中圖籍萬卷，鍾王墨跡尤多……」

⑥⑩ 關於南唐法帖，一般都指《昇元》、《保大》、及《澄清堂》三帖。明人李日華等又搨出有《建業文房帖》。但這些帖都已不存在，因此難以論辯。關於諸帖的刊刻，以及它們和淳化閣帖之間的關係，參閱林志鈞，《帖考》(無出版處，1962)，頁1~14；15~31，其中有詳細的論述。

⑥⑪ 見李調元，《全五代詩》(臺北：新文豐出版社影印，1984)，卷24，頁381。

⑥⑫ 這首詩，有人以為是他的兒子李璟(中主)所作。見李調元，同上註。

息。他的養父徐溫「不識書」。⁶³ 至於楊行密手下諸將，素質更差。據《釣磯立談》所載：

自楊氏奄有江淮，其牧守多武夫悍人，類以威驚相高，平居齋几之間，往往以斬伐爲事。至有位居侯伯，而目不識點畫，手不能捉筆者。⁶⁴

在這種情況下，他能在書法和文藝方面培養出深厚的興趣和創作的的能力，可稱異數。

由於烈祖能文能武、英明有儒雅之風、威嚴又能禮賢下士，加上他又有計劃的延攬人才，因此吸引了許多來自各地的文臣武將。根據《釣磯立談》：

烈祖以軍功牧界州，初以文藝自好，招徠儒俊，共論治體，總督廉吏，勤恤民隱。由是，遠邇宅心，以爲己歸……⁶⁵

……於其所居第旁，創爲延賓亭，以待四方之士。遣人司守闕微，物色北來衣冠，凡形狀奇偉者，必使引見。語有可採，隨即陞用。聽政稍暇，則又延見士類，談宴賦詩，必盡歡而罷。了無上下貴賤之隔。以此二十年間，委曲庶務，無不通知，興利去害，人望日隆。⁶⁶

又，龍衮的《江南野史》也說：

（烈祖）乃治府署之內，立亭號之曰『延賓』。命宋齊丘爲記，以待多士。……時中原多故，名賢夙德，皆亡身歸順。乃使人於淮上，以厚幣資之。既至。縻以爵祿。故北土士人，響風而至者，殆數千人。羽翼大成，裨佐彌衆。……⁶⁷

此外，烈祖建國後，有鑑於當時各國由於武人專權，吏治敗壞，因此專

意任用儒臣行政。《全唐文》中，收有他的一篇〈舉用儒吏詔〉，可爲證明：

前朝失御，強梗崛起，大者帝，小者王，不以兵戈，利勢弗成，不以殺戮，威武弗行，民受其弊，蓋有年也。或有意於息民者，尚以武人用事，不能宣流德化，其宿學巨儒，察民之故者，巖巖之下，往往有之。彼無路光亨，而進以拊僇爲嫌，還以清寧爲樂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？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？昔漢世祖數年之間，被堅執銳，提戈斬馘，一日宴然。而兵革之事，雖父子之親，不以一言及之。則兵爲民患，其來尚矣！今唐祚中興，與漢頗同。而眇眇之身，坐制元元之上，思所以舉而錯之者，兢兢在疚，罔有所發、三事大夫，可不務乎？自今宜舉用儒者，以補不逮。⁶⁸

又，我們根據馬令和陸游的《南唐書》諸列傳資料，歸納得知當時來歸江南的人，最多是來自江北，包括山東、河南、陝西和山西；此外也有四川、福建、和廣東地區的人。來自山東的譬如潘處常，史虛白，劉彥貞，高越，盧文進，孫忌，韓熙載，潘佑和李廷珪父子；來自河南的包括王彥偉，朱元，李平，張延翰；來自陝西的有常夢錫；來自山西的有張易；來自四川的有陳曙；來自福建的有陳貺，江文蔚，游簡言；而來自廣東的則有陳陶等人。⁶⁹

那麼烈祖對於這些人才的取捨，和文藝活動的態度又如何呢？以我的觀察，他是以實用爲原則：文藝的活動隸屬於政治的利益之下。我們從下面一些例子中便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這個特點。那些來歸的文武人才多半經過烈祖的嚴格挑選。凡是做事認真，敢直言極諫的，他必給予獎賞，譬如《全唐文》中便收了他的一篇〈旌張義方直言詔〉：

孤始任義方以風憲，乃能振朝綱。辭皆諫切，可宣示朝野。賜義方衣一襲，以旌直言。⁷⁰

而凡是個性放浪不羈的，縱有文才，他也不予重用，頂多安置一個小職務，譬如才氣縱橫、大名鼎鼎的韓熙載便是一個例子。韓從剛剛來歸（926）開

⁶³ 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4，卷266，頁8700。

⁶⁴ 無名氏，《釣磯立談》，頁45。

⁶⁵ 無名氏，《釣磯立談》，頁45。

⁶⁶ 同上註，頁47。

⁶⁷ 龍衮，《江南野史》，卷1，頁72。

⁶⁸ 見《全唐文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影印1814年版），冊3，卷128，頁1612。

⁶⁹ 參見馬令和陸游的《南唐書》中這些人物的個別傳記。

始，甚至歷經烈祖一朝，始終都不得高位，因而悵鬱不得志。^{⑦①}而有些人，在不被烈祖引用後，便隱居起來，如史虛白等人。^{⑦②}又，《釣磯立談》的作者和他的父親也是如此。在該書序文中他明白的說：「叟山東一無聞人也，清泰（934～36）年中，隨先校書避地江表，始營釣磯於江渚……」^{⑦③}這些四方來集的文人儒士，不論是否效命朝廷，或隱居山林，都和當地的人才共同匯集成重要的文化資源，造就南唐文風鼎盛的局面。

烈祖由於自己喜好文藝，因此也經常與屬下的文臣儒士聚會宴飲，並趁興作詩。由於他的個性猜忌，因此當他發現如果有人敢在字裡行間寓意頂撞之時，便毫不猶疑地予以懲罰。李調元的《全五代詩》中有如下的例子：

初、李昇蓄異志，欲有江南。雪天會群僚。宋齊邱、徐融等出。令借雪取古人名以諷之。惟齊邱稱旨。融意欲挫昇。昇大怒，收而投之江。昇曰：『雪下紛紛便是白起。』齊邱曰：『著履過街必須雍齒。』融曰：『明朝日出爭奈蕭何！』^{⑦④}

藝術如非為政治服務，則他絕不能接受。當他自還在打天下時，便曾說「兵民困苦，吾安可獨樂？」因而「縱遣侍妓，取樂器焚之」。^{⑦⑤}又當中主還是齊王的時候，有一天，「烈祖幸齊王宮，遇其親理樂器，大怒，切責數日」。^{⑦⑥}他發怒的原因並不在於反對音樂本身，因為他自己便曾為了伶人申漸高擅長音樂，而提拔他當教坊部長的要職。^{⑦⑦}顯然，他認為將為人君的齊王應當關心國事，或從事較實際的藝術活動，比如書法與詩文，而非「親理樂器」這種無用之事。的確，在他的督導下，他的諸子也都能詩文和

⑦① 同註⑥⑤

⑦② 韓熙載傳，參見徐鉉，〈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韓公墓誌銘〉，《騎省集》，卷16，頁122～124；又見馬令《南唐書》，卷13，頁56～57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卷9，頁55～56。

⑦③ 參見馬令和陸游的《南唐書》，隱者傳部份。

⑦④ 無名氏，《釣磯立談》，序文，頁45。

⑦⑤ 李調元，《全五代詩》，卷24，頁381。

⑦⑥ 見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，冊15，卷278，頁9089～90。

⑦⑦ 陳彭年，《江南別錄》，頁124。

⑦⑧ 申漸高傳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25，〈談諧傳〉，頁98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4，〈雜藝方士〉，頁79～80。

書法。^{⑦⑨}中主的書法學羊欣，而後主學柳公權，兩人並擅長詩詞。^{⑦⑩}這當然也是受到烈祖的影響。

總之，烈祖對於文藝的取捨是偏好實用而排斥非實用性的藝術。這與他的生長背景有極大的關係。由於他早年生活的困頓艱辛，養成他重事功而輕享樂的個性。在政治上他儉樸勤政，在取才方面他重實幹而輕風流，在文藝上他則偏好書法、詩詞與收藏。這種種務實的作風共同營造了南唐初期國勢的豐實與鼎盛。

臺灣大學學術
期刊資料庫

⑦⑨ 參見馬令，《南唐書》，卷7，〈宗室傳〉，頁33～36；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〈烈祖諸子〉，頁74～76。

⑦⑩ 陸游，《南唐書》，列傳卷13，頁74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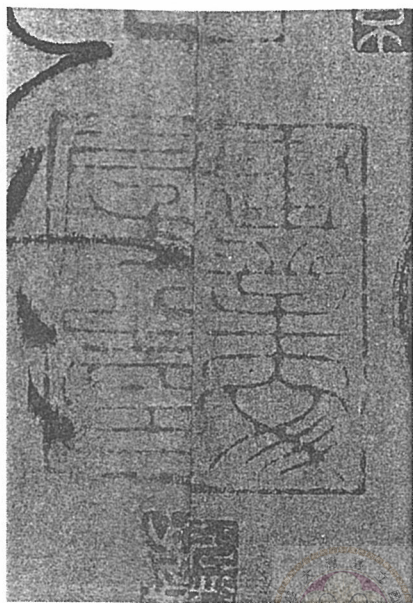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



圖2



圖3

- 圖1 「建業文房之印」 採自唐 懷素
《草書自敘帖》 777 臺北故宮博物院
- 圖2 「南唐邵周和王(紹顏)重裝題記
昇元四年(940) 採自唐 懷素
《草書自敘帖》 777 臺北故宮博物院
- 圖3 「內殿(?)圖書」印記 採自唐 韓幹
《照夜白》 The Metropolitan Museum
of Art, New York